

经济转型与企业制度创新的经济史探索

易绵阳

新中国经历了三次经济转型: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转型、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由于企业是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市场主体,所以企业制度创新就成为经济转型的关键。从经济史的视角探究经济转型与企业制度创新,深入总结经济转型的历史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此种考虑,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于2015年7月11日到12日在湖南工业大学召开主题为“经济转型与企业制度创新”的学术会议,36位学者参加了会议,现将学者们的观点作一简要综述。

一、关于经济转型

“十五”到“十二五”,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城乡关系发生显著变化的15年,又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武力和李杨概括这15年中国经济转型取得重大成就: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大幅度提升、工业化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化加速推进、教育科技快速发展。但一些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经济问题也集中凸显出来: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理顺;二是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实现转变,资源、环境、压力增大;三是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财政、就业压力增大,债务风险增加;四是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创新和产业升级困难。叶明勇考察了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认为建国初期国家推行“以工业化为基础,优先建立和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方面使新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经济效率的低下使得这一战略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放弃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转而实施市场经济战略。在经济发展战略转型过程,中国面临技术创新不足的困境,发展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是破解这一困境的有效办法。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内外失衡的现象,王磊和王年咏认为贸易双顺差的持续扩大、外汇储备激增、高储蓄与低消费并存是经济失衡的表现,造成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主导的要素驱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使得各地经济转型的路径各不相同,郑有贵等基于2015年对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四川省攀枝花市、贵州省六盘水市等地的调研,就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进行了探究,认为西部资源型城市转型要克服零乱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盲目性,以循环经济理念为统领,以构建循环产业体系为方向,谋划产业布局。在计划经济时期,民间金融被遏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的融资需求刺激了民间金融的勃兴,私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的民间金融发展尤快,朱海诚对浙江民间金融的规模进行了测度,认为到2014年,浙江民间金融规模已经占到浙江GDP总量的32.3%,鉴于这一状况,政府一方面应该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并鼓励其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以防止金融风险的发生。生态破坏是经济转型的一项重大成本,王瑞芳探究了改革开放以来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状况,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稳定发展和效果最好的时期,90年代以后,面对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状况依然严峻的局面,各地政府围绕防治水土流失、减少入黄泥沙、改善生态环境和农业基础条件、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启动了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取得了新的成效。

[作者简介] 易绵阳,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教授,株洲,421008,电子邮箱:yimianyang0115@163.com。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经历改革初期的“无限供给”向新世纪的“有限剩余”的转变,宋士云通过分析2004年和2010年全国出现的“民工荒”,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状态。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是中国转型过程中出现一种新现象,隋福民利用社科院经济所对无锡、保定的调查数据,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这些地区的非农就业情况,认为收入上的比较优势是诱致农民非农就业的主要原因。

“一带一路”战略是经济新常态下调结构、促增长的重大举措,彤新春从交通视域考察了“一带一路”战略的逻辑进路,认为伴随着铁路、公路、飞机、航运等交通覆盖半径的扩展,缩小了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同样,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一带一路”所追求的均衡、协调与共同富裕的理念在走出去战略中也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也能够在沿线国家、尤其是欧亚间取得合作共赢的成果。海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点,周建明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连通了东盟、南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形成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东盟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沟通南亚、印度洋不可或缺的一环,广西是我国与东盟国家陆地直接接壤而且海上有港口的唯一省份,是大西南的出海口,也是周边省区与东盟联系最便捷的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给具有地理优势的广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二、关于企业制度创新

与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企业投融资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董志凯对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拨改贷、贷改投、债转股的企业投融资方式演进过程进行了剖析,指出企业投融资方式变迁的总趋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目标下,尊重企业主体的权益与责任,调动企业的能动性。商业信用是企业的一条重要融资渠道,赵学军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出发,讨论了60余年来国有企业利用商业信用融资的原因、政府对商业信用的规制、商业信用在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博弈中的扭曲与变异,商业信用创新与发展障碍等问题。

如何界定中共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体现党对经济工作部门的领导,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复杂关联交织的问题,庞松探究了我国企业领导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认为中国所确立的厂长负责制,完善了国企的治理结构,迈出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关键性一步。杨德才和刘颜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探究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优目标和路径选择,认为我国国企改革效率最优目标并未实现,其原因主要是意识形态滞后、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和缺乏顶层设计。杨帆分析了2005年以来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认为所引进的苏格兰皇家银行、瑞士银行、高盛集团、安联集团、美国运通等战略投资者的绩效并不显著,有的甚至变成了战略投机者。中小企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迅速发展,但缺乏竞争力是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难题,于文浩以日本机械工业中小企业为例,分析了日本中小企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机制,认为我国中小企业可以借鉴日本经验,通过形成独立的产业形态、生产中高端产品提高自身竞争力。人才是工业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姜长青分析了建国初期东北工业企业恢复中人力资本所起的作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企业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因效率低下而饱受诟病,但朱高林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企业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有其历史合理性,对于保障人们生活、维持社会稳定和推动工业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合作社是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农村涌现了社区型合作社和专业型合作社两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易绵阳从发生机制、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分配制度四个方面对两种合作组织进行了比较,认为两种合作社解决的是不同的农村问题,社区型合作社主要解决农民对社区集体资产收益的索取问题,而专业型合作社是为了实现农民经营收益的最大化。常明明探究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业合作社在农业技术进步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人民政府利用农业合作社这一载体,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加大了农田水利建设力度,改革了传统的耕作制度,改进了耕作技术,

向广大农民传授了病虫害防治知识。尽管在推进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体而言,农业合作社的技术改造还是取得了较大成绩。

还有的与会学者就会议主题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武力和肖翔从后发大国视域出发,探讨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规律。李占才就小康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社会结构进行了分析。张连辉剖析了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植物保护与农药污染问题。杨祖义对台湾和新加坡经济发展进行了比较。刘巍就经济史“研究链”进行了阐述。苏少之从一则史料的运用谈了经济史研究的学风问题。

(责任编辑:黄英伟)

一部深入考查近代国防和军队改革史的力作 ——《华洋军品贸易的管理与实施》出版

解放军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南京政治学院军事历史青年学者费志杰撰写的《华洋军品贸易的管理与实施(1860—1911)》,这是一部史论与史料俱佳的军事历史力作。1840年西方列强依靠船坚炮利敲开中国大门,此后外国商品以空前的规模涌入中国,对于基本上还处于冷兵器时代的中华帝国而言,军事用品的进口不仅使极度落后的清朝军队藉此开始加速向近代军队靠拢,并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资料的原因,历来对近代军品的进口研究不足,长期处于初步的阶段,遂使得这方面的历史状况,较少为学界所知晓。在这一方面,该著作无疑成为目前最详尽的研究成果。全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史料较为扎实:选定题目后,作者充分挖掘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陆军部、海军部等相关档案;同时,又独辟蹊径,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中发现了不少稀见史料,如《枪枝子弹进口新章》以及《税务处改订枪弹进口新章》等晚清政府军品进口规章,在目前港台和大陆关注此问题的学者著述中尚未出现。外国驻华洋行经营军品贸易的具体信息也多有披露,如光绪十年新载生洋行呈递克虏伯新炮价目清单、光绪十三年德国克虏伯厂向山海关道盛宣怀呈递火炮价目等。还研究梳理出了《外洋军品购运流程示意图》,以及《辛亥前清政府订造的所有外洋舰船一览表》等重要内容。综合各类资料,考查了1874年日本侵台期间中日海军军力对比以及1894年甲午战争时中日海军军力对比情况,还详细考证了英国人李泰国代购阿思本舰队组成情况、美国人亨利华尔代沪在美所购舰只情况。还结合相关档案,对中外军品贸易的运输路线进行了研究,初步描画了中德、中英、中美、中法军品贸易路线示意图。

二是内容比较丰富:首先,以陆军部为核心考查了清政府衙门部府对军品贸易的管理。其次,以赵尔巽为个案,对晚清各省督抚在军品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考查。以盛宣怀为观察视角,考查了海关监督在军品贸易中的重要作用。详细考查了列强通过在华洋行对华洋军品贸易实施的垄断过程。依据相关资料描画出了华洋军品贸易的大致路线。华洋军品贸易的来源国主要包括德国、日本、英国、俄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典、荷兰、葡萄牙、丹麦等列强国家,其中尤以德国、英国为主。军品接收地基本是通商口岸,随着牛庄、烟台、镇江、吴淞、上海、宁波、福州等口岸的不断开辟,西洋军品运输来华的接收地更趋多样化。

三是观点较有新意:晚清华洋军品贸易的管理与实施,涉及到的部门和人物相当复杂,本书认为,自洋务运动肇始直到辛亥革命,清政府向外洋订购的百余艘舰船主要由衙门部府和北洋及南洋大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直接与海军驻地相关的高阶督抚来完成,而购买的难以计数的陆军枪炮和军工厂所需设备物料则主要由各地督抚来主持。此外,津海关等要关的海关监督则在军品贸易中承担着超出一般督抚的重要角色。在列强对华洋军品贸易的控制上,主要以洋行为媒介,军工厂销售员、驻华公使、驻各关税务司等中外人员纷纷向清廷推介生意。在内外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清廷武器管理部门丧失了很大的军品采购权。直到清末新政进而编练新军期间,清廷对军品外购的实际控制才有所加强。

(吴松弟)